

从资源角度看中国人口的优势和劣势

穆光宗

从资源开发的角度看,人口资源具有三种形态,而且,因其内在的关联构成了一个塔式结构,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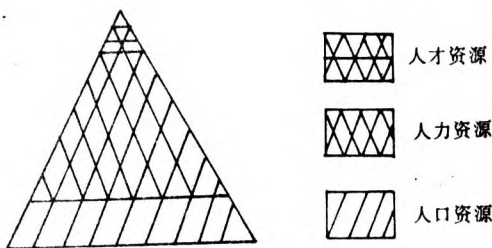


图1 人口资源金字塔

图中的人口资源系指总人口,但不包括素质指数为零,因而无任何资源价值的“零素质人口”。所谓“零素质人口”,是指智能及心理高度残疾或者身患沉痾(语言、记忆、定向、思维等存在明显的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以致于已无素质和潜能可言,仅仅是作为活的生命体存在而无康复价值和发展可能的人口群体。

具体来看,人口资源又有四种存在形态:已开发的人口资源,如退休人口;正开发的人口资源,如在业劳动力人口;待开发的人口资源,系指待业或失业人口;可开发的人口资源,系指准劳动力人口亦即未成年的青少年人口。

所谓的人力资源实际上是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资源,但一般指成年的劳动力资源(15岁及以上),退休的老年人口有再就业的可能性,因而在此也纳入人力资源范畴中去。当然,人力资源的主体是指15~64岁的劳

动适龄人口。

所谓的人才资源是指掌握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人口。在现代社会,尽管也不乏自学成才者,但大多数人才资源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

根据人口资源的塔式构成,如果人口资源中人力资源的比例较大,说明资源是充裕的,但这仅仅是指一般的资源,是一般的“矿藏”。如果人口资源中人才资源的比例较大,也说明资源是充裕的,但这是特殊的资源了,有特殊的价值,是人口资源中的“金银矿”,因而也就意味着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如果人力资源中人才资源比例较高,则说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较高,是优质的人力资源。

如此看来,要判别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丰裕程度,一要看一般人力资源占总人口资源比例的高低,二要看一般人力资源总量中特殊人力资源(即人才资源)所占比例的大小。这是一种数量——质量的双重标准。

显而易见,人口资源、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是不宜笼统而言之,这里有总量和个量的联系,有一般和特殊的区别。而且,一般资源的价值体现在特殊的资源身上。这样,合乎逻辑地,人才资源比例的上升意味着资源开发的前景美好。

如果说人口资源从总体看主要表现为一种消费力的存在,那么一般的劳动力资源似可看作“人手”的存在,一种操作力的存在。唯独特殊的人才资源其显著特点是一种类似于“人脑”的存在,一种创造力的存在。这里,操作力也是一种生产力,只是低级的;作为创造

力的生产力才是高级的。

如果说“控制人口”是一种节流——所起的作用就是压缩需求总量以弱化和控制消费力；那么“利用人手”、“开发人脑”就是一种开源——所起的作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节流和开源需要并重，但开源无疑是更起作用因而也是更为重要的。控制人口数量也好，提高人口素质也罢，其最终的立脚点都应当是现有的人力资源充分、有效、合理的开发，因为它是国民财富的真正源泉，也是文明进步的真正主题。

看来，我们不能光把两只眼盯在“节流”上，根本的还在于“开源”——通过利用人手和开发人脑来增加生产力总量，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要花大力气开发蕴藏在几千万知识分子中的脑力资源。

中国已有11.8亿人口，也就是说有11.8亿个大脑。如果能够建立人口大国的“大脑优势”，几亿人都有健全、发达的大脑并能做到人适其位、人尽其才，到时就不愁中国“站”不起来。

中国藉以站起来的是大脑，是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这是中国人口的优势所在。但这优势的发挥离不开下蛋的“母鸡”——教育，也离不开“母鸡”的生长环境——制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的人口越多，在理论上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源越是丰裕。这样，就可能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中国人多，要多少有多少，按照美国著名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二部门理论模型，几乎就是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依前述，要考察一国人力资源的丰裕程度，不仅要看一般性人力资源的比例，而且要看特殊性人力资源的比例。就中国而言，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特殊性人力资源即人才资源匮乏。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一般性人力资源（15~64岁）占总人口比例为66.8%

（比1982年高出5.3个百分点），农村一般性人力资源占乡村总人口比例为63.8%。但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农村尚有6500余万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即在农业生产中出现季节性劳动时间剩余。与此同时，我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冗员绝对规模估计在1700万以上，而每年的待业人口也以百万计。

然而人才问题却成为今日中国走向一个发展的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按宽口径估算的我国知识分子人数（包括科技人员）约2000多万人，仅占总人口的2%~2.5%（发达国家一般为25%~45%）。四普资料还告诉我们，在我国农村，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特殊性人力资源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比例为34.26%，其中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大学本、专科毕业）只占0.22%。其实，特殊性人力资源的匮乏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人才大战中，从1993年对大学生需求过旺出现“卖方市场”等现象中都可找到佐证。

显而易见，人力资源丰裕与否不能一概而论。从数量角度看如此，从质量和结构的角度看则不然，特别是近几年基础教育滑坡，每年上百万青少年失学、辍学造成未来特殊性人力资源更加匮乏。本来基础就不好，这么一来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不可避免的人口老龄化也将使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受到不利影响，结果是：（1）劳动力相对甚至绝对短缺；（2）社会活力降低，创造力削弱，最终则损及国力的竞争。从国际范围看，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已完成现代人口转变的国家和地区有了有目共睹的表现。譬如，日本到本世纪末，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绝对减少看来已成定势。1971年日本新增人口200万，相当于1991年进入就业市场的高中毕业生数。1980年，新增人口降至157万（按这种趋势推，预计到2000年新增人口还将减少22%），1990年，新增人口是120万，这意味着到201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中毕业生将比1990年减少40%。日本人惊呼

正面临一场新的民族危机!人口老化对日本的经济奇迹构成了威胁,或许日本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神话”终将在难以阻遏的“灰白色浪潮”的冲击下归于幻灭。

无独有偶,最近,意大利公布了立国以来第13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意大利人吃惊地发现:1981~1991年这10年间,意大利的人口总数一直停留在5600万,接近零增长。据推计,再过10年,意大利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人口半数以上。给人的感觉是“白色浪潮”涨潮了,出现了人口高龄化的新态势,难怪意大利人要为自己感慨一番了:“我们的国家比以前富了,但却老了。”

发达国家今天的人口状况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因为根源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人口老化规律是独立于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之外的。面对现实的困惑,我们要反思国内学界倡导了许久的一个政策目标:人口零增长。这就是,人口零增长是人类人口运动的“共产主义”目标吗?人口零增长的实现是否意味着人口问题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哪怕是数量问题)?(这里我们只是顺便提出问题而不展开讨论)

毫无疑问,人口老化对人力资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具体到中国,时下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不存在人口老化后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相反,我们将面临劳动力就业的巨大压力。

应当指出,这是一种纯数量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在面临总人口继续增长、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这两大趋势外,还面临着生产年龄人口激增的趋势。目前,15~59岁生产年龄人口占总人口63.71%(四普数据),预计2000年可增加到64.29%,2010年为67.14%,差不多每10年绝对规模就增加1个亿(1990年普查时为72227万)。再往后比例将开始下降,到2020年下降到目前水平,2030年可下降到59.45%,2040年可下降到58.76%左右。未来特殊性人力资源所占比例如何变化至今还是一个问号。如果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综合角度看,今后的实际情形肯定要比单纯的人口数量预测来得复杂,譬如,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地区性短缺等问题会接踵而至。

考虑到改革开放深化的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初始成长阶段中国经济有加速发展的巨大可能性,所以特殊性人力资源的供不应求所造成的缺口将进一步拉大。而要堵上这一缺口,除了建立全国性人才市场以完善人才资源共享机制外,还要通过教育培训系统不断追加人力资本投资以使一般性人力资源逐步向特殊性人力资源转化。否则,表面上看起来无比充裕的人力资源只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和社会危乱的诱因。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上接第22页)5. 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为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应该是可以自由流动的,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转移可以促进农村地区产业的区域分工以及农业的规模经营。但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不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特别是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更是严加限制。与户籍管理制度相对应的一系列维护城市利益的不合理政策和规定,一起构成了具有很强刚性的二元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严重阻碍

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尤其影响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方面的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彻底加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路是:消除对人身的各种特权利益的束缚,实行户籍自由流动制度,同时在配套改革方面应废止与其相应的不合理财产、分配、社会福利、教育制度以及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地方保护主义”,从而使人口、劳动力、产业的扩散与聚集真正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进行,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全国统一市场内畅通无阻。

(作者工作单位:《市场经济研究》编辑部)